

中华学人论稿

徐传武 桑哲 主编

# 犹太人· 犹太精神

张倩红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犹太人·犹太精神

张倩红

著

K18/6

张倩红

2009.4.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太人·犹太精神/张倩红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0  
(中华学人论稿/徐传武,桑哲主编)

ISBN 7-5059-3458-9

I. 犹… II. 张… III. 外国—民族研究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760 号

书 名	犹太人·犹太精神(中华学人论稿丛书)
作 者	张倩红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55 千字
印 张	9.8125
插 页	3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458-9/I·2636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张倩红，1963年生，河南省灵宝市人，198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1990年获辽宁大学史学硕士学位。1995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获西北大学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南大学“跨世纪学术群体·历史学科”主要成员、河南省第二批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1999年9月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犹太学、中东史、世界史，曾在《世界历史》、《民族研究》、《世界民族》、《西亚非洲》、《二十一世纪》(香港)、《思与言》(台湾)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主编或参编著作6部。

# 《中华学人论稿》总序

徐传武 武侠小说

我们曾编纂丛书《中国文学新论》，所收范围为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有关论著。在此书征稿过程中，中国文学之外的有关论著的作者也想以《中国文学新论》的方式出版自己的著作，因而促使我们又有了编纂起这套《中华学人论稿》来的动意。这套《中华学人论稿》较之《中国文学新论》来，所收范围更为广泛，举凡文、史、哲、社等等各个方面的论著，都在我们《论稿》的视野之内。

我们编纂《中国文学新论》时，特别强调“创新”精神，这套《中华学人论稿》虽未以“新”为名，但同样强调“创新”精神。我在《中国文学新论》的序言中说：

学术贵在创新，或者说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孔老夫子虽自谦为“述而不作”，但实际上他在“述”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许许多多创新的成分，他那“仁政”学说、“忠恕”之道、“中庸”主张，他那教育理论、治学思想、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各种观点，都有许多对于前人或同时代人来说是属于创新的东西，否则他怎么会成为影响遍及古今、遍及中外的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郑板桥有语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sup>①</sup>“领异标新”，就是创新，“领异标新”，才会有勃勃生机。有了“领异标新”的众多的鲜活之花，才会装扮出祖国万紫千红的学术之春。有自己独到的理论、独创的观点，有较高的质量、较高的学术品

<sup>①</sup> 清·郑燮：《楹联》。

位,期望论著的问世将对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积极的推进作用——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名之为“新论”的初衷,这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编纂的主旨。

以上所言,也是我们这套《中华学人论稿》编纂的“初衷”与“主旨”。我在《中国文学新论》的序言中还说:

当然,我们提倡的“创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非胡创乱来,随意追求什么新奇怪异。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山东大学文科学报《文史哲》新近确立的办刊宗旨是:“严肃严谨,求是求真,繁荣学术,扶植新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正契合了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心愿。我们的“新”,是建立在“二严”、“二求”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一切所谓的“新”,都不过像是光怪陆离的肥皂泡,一时也许好看得很,但过不了多久,可能也就会销声匿迹了。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虽不敢说人人都是抱荆山之玉,个个俱是握灵蛇之珠,但他们的论著的确都是花了多年的功夫研究之所得,都有自己的创见,当然,也就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有的论著之全部或其中的某些部分,在全国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得到了同行专家的好评,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有的甚至有填补空白之效,则更为我们这套丛书增辉了。在当前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用这种丛书的形式把许多人多年心血的结晶出版,这也算是为“繁荣学术”做出点贡献吧。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除去少数老专家、老学者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学者,有不少是毕业不久或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这实在是我们学术队伍中的令人骄傲的生力军——他们的论著却难以出版,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的确是一件很值得遗憾的事。“新松恨不高千尺”,<sup>①</sup>一千多年前诗圣杜甫的话更激励着我们为“新松高千尺”做出点贡献。虽然用“扶植新人”这话或者对我们来说还很不够格,但确实确实蕴含着我们的这种美好心愿。

<sup>①</sup> 唐·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

《中华学人论稿》作者及其论著的情况，大体也和以上所说的《中国文学新论》的情况相同；以上所说的“严肃严谨，求是求真，繁荣学术，扶植新人”的话，也同样体现了我们编纂《中华学人论稿》时的心愿。

古代和近、现代的中华学人在治学上、在为文上积累了许多优秀的传统和宝贵的经验，作为《中华学人论稿》的编纂者，我们衷心希望这部丛书的作者能够好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的东西。前面提到的“创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司马迁通史体式的设立，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等五种体式的建构，都是前无古人的全新创造，因而才赢得了“史家之绝唱”<sup>①</sup>的美誉。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七中说：“萧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陆放翁曰：‘文章切忌参死句。’黄山谷曰：‘文章切忌随人后。’皆金针度人语。”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唐人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惟陈言之务去。”宋人刘克庄在《贺新郎》词中说：“常恨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卷一中说：“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清人许印芳在《与李生论诗书跋》中说：“凡我见闻所及，有与古今人雷同者，人有佳语，即当搁笔，或另构思，切忌拾人牙慧。”等等，等等，都是强调这种“求新”的精神的。

前面提到的“严肃严谨，求是求真”，也是我们中华学人的优秀传统。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据实写史，受到后人赞扬。唐人吴兢撰写《武后实录》，其中有张昌宗劝张说诬证魏元忠事，后来张说为相，乞求吴兢修改，吴兢说：“徇公之情，何名实录？”终不肯改。时人称之为“今董狐”。<sup>②</sup>司马迁所写《史记》，被人称之为“其文直，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② 见《新唐书·吴兢传》。

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典范。<sup>①</sup> 即使写当代事，对汉高祖、汉武帝这样的最高统治者，太史公也照实写出了他们并不光彩的行为，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说：“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三国志》撰者陈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衬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sup>②</sup> 也是这种“二严”、“二是”精神的体现。诗家曰“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sup>③</sup> “爱惜芳心莫轻吐”，<sup>④</sup> 讥讽“轻薄为文哂未休”<sup>⑤</sup> 之辈，也可以说折光式地反映了这种“二严”、“二是”的精神。姚雪垠曾说：“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和作家，不管是中外古今，都和态度严肃不严肃，认真不认真有关系。”<sup>⑥</sup> 这是成功的经验之谈。

中华学人治学都十分推崇坚韧、勤苦的精神。“头悬梁、锥刺骨”、“囊萤”、“映雪”的美谈；李贺“晓月当帘挂玉弓”，<sup>⑦</sup> 在彻夜苦吟；白居易“苦学力文”，甚至到了“口舌成疮，手肘成胝”<sup>⑧</sup> 的地步：都是这种勤苦精神的体现。许多著名人物的“劝学诗”，都非常强调这种勤苦、坚韧的精神。唐诗人吕温曰：“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sup>⑨</sup> 唐诗人杜荀鹤曰：“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

① 见《汉书·司马迁传》。

② 南朝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③ 唐·卢延让：《苦吟》诗。

④ 金·元好问：《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诗。

⑤ 唐·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

⑥ 姚雪垠：《我的粗浅经验——给青年同志们的一封信》。

⑦ 唐·李贺：《南园十三首》之六。

⑧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⑨ 唐·吕温：《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诗。



情寸功。”<sup>①</sup> 宋诗人陆游曰：“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sup>②</sup> 宋代大学者朱熹的《劝学》诗则曰：“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今人董必武在《题赠〈中学生〉》的诗中说：“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古云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秒阴。”叶剑英的《攻关》诗则曰：“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赵朴初《为〈学人谈治学〉题诗》则曰：“壹志金可镂，多闻道不穷。艰难成学业，终达妙高峰。”陈毅写诗告诫子女们则曰：“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sup>③</sup> 这些话表明了学知识、做学问要肯下苦功夫、死功夫，不能有偷懒和投机取巧的心理，然后才能取得较大的成就。

古人认为治学有大成就者应该有渊博的学问，卓异的见识，集才、学、识于一身。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说，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学家，需才、学、识兼备，三者缺一不可。在这三者中，他又特别强调“识”的重要性。后来宋人孙复、清代学人袁枚、文论家刘熙载、文史学家章学诚、现代著名文人郭沫若等都曾论述这三者对于成才的重要性。我在给研究生讲课时也曾强调这三者，特别是“识”的不可或缺。我说：“[治学]一方面要有雄厚的基础，要有深厚的学养，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目光、见识，才能见别人所未见，为别人所未为。司马迁、鲁迅等之所以能成为横空出世、雄视百代的文化巨人，除了因为他们具有渊博的知识之外，还因为他们具有卓绝的见识。和他们并世的文人，单从知识占有量上来看，和他们相似者也不乏其人，为什么他们能拔地而起，成为史学、文学方面顶天立地的巨人呢？就因为他们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识见。”“没有才、学，会流于浅薄，难以有大作为；有才学而

① 唐·杜荀鹤：《题弟侄书堂》诗。

② 宋·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诗。

③ 陈毅：《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诗。

无见识，那雄厚的才学也不能尽其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往往缺乏创造性，自然也难以取得较显著的成绩。‘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没有眼光、见识，虽辛辛苦苦地干，也往往抓住了芝麻，丢掉了西瓜。‘吕端大事不糊涂’，做学问，搞科研也是如此，有了眼光，就能从大处着手，抓住关键之处，时机成熟，就能抱住一个‘大金娃娃’。”<sup>①</sup>古人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sup>②</sup>“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sup>③</sup>“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sup>④</sup>这些富有哲理性的诗句也可借以理解治学需要高瞻远瞩的道理。

中华学人都很注重充分吸收前人的各种研究成果，孔子、司马迁、鲁迅、毛泽东等大家，哪一位不重视汲取前人的“遗产”？为学“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所以能“居上”，就是因为凭借了前人的积累，站到了别人“肩上”的缘故。杜甫曰：“不薄今人爱古人”，<sup>⑤</sup>“转益多师是汝师”。<sup>⑥</sup>今人萧劳在《为〈学人谈治学〉题诗》中说：“治学功夫集众长，永传薪火接辉光。”也是说的这个道理。这样做可以节省时间，别人下过功夫之处，我们可以不必再重复；这样做可以减少谬误，少走弯路，有些问题前人已纠缠，我们不必再沿袭错谬或重蹈覆辙；这样做我们还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来个更大的突破或创新。红学专家戴不凡认为“得随时注意搜集自己有用的材料”。<sup>⑦</sup>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蔡尚思为写《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曾在一个大图书馆里“翻查了几万卷文集和搜集了几百万字

① 拙文《与研究生谈治学》，见拙著《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下册第1440、144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唐·王之涣：《登鹳雀楼》诗。

③ 宋·王安石：《登飞来峰》诗。

④ 宋·晏殊：《鹊踏枝》词。

⑤ 唐·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

⑥ 唐·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

⑦ 戴不凡：《治学絮语》，见《学人谈治学》一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的思想史料”。<sup>①</sup>磨镰不误砍柴工，这样做往往会收事半功倍之效。此外，中华学人还很注重“学”与“思”的关系。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sup>②</sup>蒲松龄则曰：“读书析疑如滤水，务使滓尽清澈底。”<sup>③</sup>中华学人也很注重学用结合，注重实践，注重读“无字书”。陆游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sup>④</sup>朱熹则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sup>⑤</sup>叶圣陶则曰：“善读未写书，不守图书馆。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sup>⑥</sup>张舜徽先生则认为：“除书本外，还应多读‘无字书’，以扩大求知领域。”<sup>⑦</sup>中华学人又很注重“精”和“通”（或曰“博”）的有机结合。不“博”不“通”，难成其大；不精不专，难透难深。不少人认为，由“博”返“约”，由“通”返“精”，才能达到真正的“精通”、“精深”。中华学人既能自信，又能自谦。有此二者，才敢于去做出成就，才不会满足于小打小闹，也就能乐意接受别人的批评，以补充自己的不足，以纠正自己的失误。偶翻《朱子语类》，见谈治学的言论不少。如：“为学须是痛切恳惻做工夫，使饥忘食，渴忘饮，始得。”（卷八）“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卷十）“学问却有渐，无急迫之理。”（卷十八）“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卷一三六）“学者不可只管守以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卷十一）“学者立得根脚阔，便好。”（卷八）“大着心胸，不可

- ① 蔡尚思：《我是怎样冲破重重难关的——有关治学的精神和经验》，见《学人谈治学》一书。
- ② 《论语·为政》。
- ③ 清·蒲松龄：《子填》诗。
- ④ 宋·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诗。
- ⑤ 宋·朱熹：《观书有感》诗。
- ⑥ 叶圣陶：《读书》诗。
- ⑦ 张舜徽：《自强不息，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见《学人谈治学》一书。

因一说相碍。看教平阔，四方八面都见。”(卷九)“学须先理会那大底。理会得大底了，将来那里面小底自然通透。”(卷九)等等，等等。细细体会，甚觉有益。中华学人的这些优秀传统和宝贵经验，是中华民族矗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巨大财富。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都有自己的显著特色，都有自己的优势与相对薄弱之处。在上个世纪与这个世纪里，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下一个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我相信季羨林先生的这个预言。<sup>①</sup>诚如是，则我们中华学人肩上的担子则更重了。今天是端午节，传说是著名爱国诗人屈原投江而逝的日子，老百姓赛龙舟、吃粽子，相传是为纪念投江的屈原而兴。屈原忧国忧民，宁可葬身鱼腹，也不肯与污浊同流。“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sup>②</sup>屈原的品格、精神、作品可与日月争辉。我们这套书名之为《中华学人论稿》，就有希望我们的编辑者、撰写者充分吸取中华学人优秀而宝贵的治学传统、治学经验之意，就有希望我们的编辑者、撰写者以优秀的中华学人为榜样，为我们祖国的文化事业多做贡献之意。明初人史谨有《屈原诗》，曰：“江边遗庙掩松筠，檐边云霞互吐吞。地接武关龙去远，泉临阿阁凤难存。湘兰日老春风飒，楚些谁招月夜魂。留得生前诸制作，千年光焰烛乾坤。”借以纪念屈原，也借以与这套丛书的撰写者们共勉。

己卯年端午节于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

① 季羨林先生曾多次谈到这个观点，1997年在山东大学主办的“面向21世纪的人文学科建设暨季羨林学术思想讨论会”上，季先生又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② 唐·李白：《江上吟》。

# 序说历史交往与犹太学研究

彭树智

## 一

序说，即以序为文体而加以论说。

本文是为张倩红的《犹太人·犹太精神》一书而写的序，并且论说历史交往与犹太学研究的关系，因此名为《序说历史交往与犹太学研究》。

自从我进入中东研究领域以来，不断接触到以色列和犹太学研究的许多问题。自从我关注历史交往课题的探讨以来，也考虑过阿拉伯史和中东现代化以及伊斯兰教的问题。然而，把历史交往和犹太学研究这二者联系在一起考虑，还是1996年张倩红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以后的事。我给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一门理论课——“世界史学概论”。历史交往是这门课的基本内容。张倩红交给我的课程作业是《浅谈犹太人的历史交往》，论述了历史交往与犹太民族精神的关系。她在讨论中谈到学习历史交往的体会时说，历史交往与犹太民族精神的关系，给她许多启发，如果把历史交往引入犹太学研究，会对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产生新的感觉和领悟。在这篇作业中，她以犹太民族的商业特征为例，具体分析了历史交往在这种特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 二

沿着犹太人的商业特征的话题，在序说中，首先分析一下历史

交往与商业的关系。

说到犹太人是一个“商业民族”，毋宁说犹太人是一个最能体现历史交往内涵和本质特征的民族。因为商业不仅是随着分工扩大而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经济交往形态，而且就其开放的本性而论，最能反映历史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表达历史交往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历史交往中的其他形式，如政治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等等，经常是以商业、贸易为纽带、为先导、为主渠道而沟通东方和西方的联系的。

商贸的最突出的作用，表现在沟通古代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商道上，在这里，文化交往有赖于商业交往的维系。中世纪欧洲犹太人的商业成就，加速造就了近代欧洲犹太资产阶级的形成，其政治、社会作用是很显然的。战争是伴随着人类而来的交往形式，是政治交往以暴力流血手段的继续。但首倡此论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却敏锐地把战争比作“期票交易”和“贸易”，而且肯定地说：“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大规模的贸易。”这样把商贸与政治两种交往形式相提并论的类比，是意味深长的。新航路的开通和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列强争夺殖民霸权的长期“商战”，更具有商业交往和政治交往的双重性质。众所周知，这种双重的大规模、长持续的历史交往，扩大了的人类活动范围，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联系犹太民族的商业特征，结合上述的种种证例，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德文 *verkehr* 一词来表达“交往”的缘由所在。德文 *verkehr* 和英文 *commerce* 意义相同，即为商业、贸易、买卖、交易等含意。但是，在英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用 *contact*, *intercourse*, *association*, *interaction* 等词表达“交往”，而用了 *commerce*。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 1846 年 12 月 28 日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作了如下解释：“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

‘verkehr’一词那样。”

这个解释清楚地表明了他没有把“交往”局限在政治、社会、文化层面上，而是从“交往”与生产实践相关的“交换”活动角度上，使用了商业、贸易相关的 *commerce* 或 *verkehr* 一词来表达他的思想。这种思想和唯物史观是一致的：“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这样，就赋予了广泛性交往概念以历史性的物质基础和辩证的动态内容，表明了人类的历史联系，从而把交往看成是同生产力发展相伴随的、以买卖商品为交换手段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人和物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和工业、交换的历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常连结在一起讨论的两个方面内容，商贸的交换关系，也被用作交往的称谓。因此，德文的“交往形式”(*verkehrsform*)、“交往方式”(*verkehrsweise*)、“交往关系”(*verkehrsverhalmise*)等名词，就不断出现在这本著作之中了。

### 三

在序说了犹太人商业特征之后，有必要再进一步概述历史交往的基本内涵和本质属性的问题，供犹太学研究者参考。

历史交往是人类根本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的集中表现，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是人类主体之间的互相发现、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互相扬弃和互相融合的交互作用的复杂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同时充满着摩擦、碰撞、矛盾和冲突，也不乏对抗、分裂、压迫、侵略和抵抗。人类经历了长期的各种形式和各个方面的历史交往，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越来越面临着全球化和多极世界的严峻挑战。对话、合作的交往，平等互利的原则，也为人们所普遍认同。21世纪的世界，将不再有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地实现和平、自由、安全和富裕。全球化要求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善于交往和开放，谁与世隔绝，谁就会成为全球化的

失败者。犹太民族为此提供了有益个案。

历史交往的本质属性是它的实践性，是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实践活动。前者是以主客体为基本结构的实践；后者是以“主体间性”或“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为基本结构的实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决定因素和制约力量；后者是前者的必要前提、伴随要素和中介环节。像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一样，交往这种实践能力与生产力相适应，在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和依存过程中，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推动着“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犹太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都以各自自身的特点，经历了交往实践活动。

同实践性这个本质属性直接相关的属性，是历史交往的开放性。任何一个人类群体，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种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历史交往中的开放性。正如同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开放系统下与外界“交换能量”才能发展的科学原理那样，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也表明，保持外部环境的开放性，扩大“历史交往”是发展生产力和文明成果传承的保证。如果说“能量交换”使火山岩环境或高温高压下产生了瑰丽的岩石和宝石，那么犹太文化虽历遭劫难，但在世界性开放的大环境下，通过“历史交往”经千祀而仍在展现辉煌。历史交往的开放性，对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历史交往的迁徙性，是同实践性这一本质属性直接相关的另一重要属性。历史交往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它犹如包括万千条江河网络交汇而不息奔流。人类群体在这种不断变动的历史交往长河中，常常表现为空间的位移。这种位移就是时时进行的人类各群体的迁徙活动。从新旧石器时代到阶级社会的产生以后，从欧洲中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大迁徙活动中，各个族群共同体之间进行着频繁的历史交往，造成了诸民族的产生、发展、吸收、扩展、聚合、分解、乃至消亡的复杂过程。有



受别的民族挤压或驱赶而四处流散民族中,当数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而尤其是辗转流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最为典型。研究它在历史交往中的分聚离合,对迁徙性属性的理解是很有价值的。

历史交往的类型性,是同实践性这一本质属性直接相关的第三个重要属性。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性在生产上表现为物质与精神生产两大类型,在交往上随之也表现为物质与精神交往两大类型。所谓物质交往类型,就是人与人之间以生产资料、工具、产品、能力、活动等物质关系及人自身等物质内容为中介的物质交换活动;所谓精神交往类型,就是人们精神生产活动及其能力、产品等等的交流活动。历史交往的精神与物质这两大类型还会分化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不同小的类型,并演化成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形态和阶段。但对精神类型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它涉及到人的本质与发展,而人的本质问题是离不开社会交往的。社会交往不但是人类的本质形成的前提,而且是人的个体本质形成的媒介;它既在人的发展中具有整合功能,又是人的全面化发展的条件。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深层世界。从这个角度看,研究犹太民族精神问题,确实是犹太学研究中的核心和前沿性课题之一。

历史交往的多样性,是同实践性这一本质属性直接相关的第四个重要属性。历史交往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在其变迁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变性,因而在联系形式上表现为多样性。以交往主体自身特征而言,有个体与群体交往之分。以交往主体地位而论,有平等与不平等交往之别。以国家和民族的时空界限看,可划为内部与外部交往。从邻域界定,则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层面。就纵向大范围涵盖分类,还有日常与非日常交往两大模式的划分。历史交往从文明层面的潜在基础结构左右着人们的活动方式。这方面有古代文明时期的原始交往、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的传统交往、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时期的现代交往这三个不同的演